

A Review of Overseas Research on Confucius Institutes to Inform Future Development

LIU Cheng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urveyed academic papers about Confucius Institutes on the EBSCO Research Data Base. It categorizes these papers into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s each addresses: 1) Why does China set up Confucius Institutes? 2) To which “Confucius” do Confucius Institutes refer? 3) What are the functions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4) What challenges will Confucius Institutes have to face? The author then distills the key elements of these papers to inform proposal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Keywords: Confucius Institutes development, research on Confucius Institutes

孔子學院海外研究現狀、特点及對策

劉 程

华南理工大学

提要

论文从梳理孔子学院海外研究现状出发(即中国为什么建立孔子学院?为什么是“孔子”学院,哪一个“孔子”?孔子学院有哪些功用?孔子学院面临哪些问题?),总结孔子学院海外研究的特点,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關鍵詞: 孔子学院, 海外研究

背景介紹

自2004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以来,截至2010年10月,中国已在世界上的91个国家(地区)建立322所孔子学院,其中,亚洲30国(地区)81所,非洲16国21所,欧洲31国105所,美洲12国103所,大洋洲2国12所(国家汉办,2010)。海外“汉语热”随之扑面而来,与此相应,海外对孔子学院的研究也悄然兴起。本文从梳理、分析海外期刊网上有关孔子学院的相关论文出发,综述孔子学院海外研究现状,总结其研究特点,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我国所应和所可能采取的应对策略,为有关部门提供思想资源和决策参考。

孔子學院海外研究現狀及特点

研究現狀

据统计(据国外学术期刊网EBSCO),孔子学院海外研究学术论文近20篇,涉及美国、新西兰、瑞典、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这些研究当中,就研究内容而言,包括汉语教育、孔子学院在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洲的情况介绍(Starr, 2009; Tan, 2006),孔子学院与我国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关系的分析(Cho & Jeong, 2008; Ding & Saunders, 2006; Guo, 2008; Paradise, 2009; Yang, 2010)孔子学院与我国外交政策的关系的阐述(Hoare-Vance, 2009),孔子学院所谓“影响学术自由”的分析(Schmidt, 2010),并从孔子学院引申出对儒家思想的深入探讨(Bell, 2009),从儒家思想出发对我国外交谈判风格的剖析(Bolewski & Rietig, 2008),等等。其中以孔子学院与我国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关系研究为最丰富。就研究方法而言,包括文献梳理

(Guo, 2008)、问卷调查(Chan, 2010)、访谈(Yang, 2010; Zhao & Huang, 2010)等, 其中以文献梳理为最多。

总的来看, 孔子学院海外研究多侧重于“外围”, 即多探讨孔子学院与本国或全球战略关系, 这充分体现了孔子学院海外研究的“实用主义”倾向。对孔子学院的内部运作, 如课程设置、教师培训、跨文化适应、教材研发、教学方法革新、信息技术运用、课堂管理、教学测量与评估、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等则少有关关注。本部分拟以四个问题为中心, 综述孔子学院海外研究的现状, 即中国为什么建立孔子学院? 为什么是“孔子”学院, 哪一个“孔子”? 孔子学院有哪些功用? 孔子学院面临哪些问题?

為什麼建立孔子學院

当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在全球成立并迅猛发展之时, 海外研究者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孔子学院。中国会在21世纪初期建立孔子学院多少让人吃惊(Paradise, 2009)。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 经济不断发展、政治地位持续提升的中国, 为什么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孔子学院? 即中国建立孔子学院的动机是什么? 海外对这方面的认识和研究包括两个方面: 一, 孔子学院的建立主要是为了顺应中国国内的意识形态需求, 缓解中国社会矛盾, 为中国高校走向世界提供平台。二, 孔子学院有助于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一个良好的、积极有为的、爱好和平的中国形象

1. 順應国内需求

Starr (2009) 认为, 中国建立孔子学院的国内动因包括, 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国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走向马克思主义。之后的25年, 中国在政治上被孤立, 经济上陷入低迷, 心理上充满多疑和恐惧, 治疗经济低成就的方法就是重新把资本主义介绍进中国, 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其标志就是中国于2002年加入WTO。尽管经过经济改革之后, 中国GDP连续多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 但对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府而言, 仅仅依靠经济成就仍旧不够。因此, 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调整势在必行, 其结果就是爱国主义的兴起。而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文化即是爱国主义的一个温和显示 (又见Hoare-Vance, 2009)。孔子学院可以增强中国的民族自豪感 (Starr, 2009)。二, 中国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强调, 导致社会矛盾加剧, 贫富分化严重, 而倡导通过教育、穷人和富人可在等级秩序中平等共处的儒家思想自然受到中国领导层的关注和青睐。三, “软实力”这一概念对中国民众的吸引力。即如果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 那么他们也就能够对中国利益更为有利。Ding & Saunders (2006) 认为,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但一国文化的自主性却随之减弱。所以可以推论说, 在一定程度上, 中国建立孔子学院是为了维护其文化的自主性。几十年前, 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 儒家思想被认为是社会变革的阻碍、历史的倒退, 从而遭到排斥和打击。如今, 儒家思想被认为可以为缓解社会矛盾、凝聚民

族力量、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支持,而“和谐”正是儒家思想的根本(Guo, 2008; Hoare-Vance, 2009; Paradise, 2009)。Cho & Jeong (2008) 则以我国于2001年实施的“国民道德实施纲要”为例,说明自江泽民时代始,中国就致力于更替社会主义理念,建立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他们还认为,中国文化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而儒家思想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之所在。

Bell (2010) 甚至直接以“调和社会主义与儒家思想”(Reconciling Socialism and Confucianism?)为题,从民众、政治、学界甚至于丹的《论语心得》等层面分析为什么现代中国需要儒家思想。作者认为,中国实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但“富起来”之后怎么办?如何维护更好的社会关系?如何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何在政治上做出更大贡献?都是亟需回答的问题。而儒家思想正可以填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道德真空(又见Guo, 2008)。作者还试图找到儒家思想与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等观念的“契合点”,倡导中国“以儒家思想代替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哪一个‘孔子’”部分进行详细剖析。而孔子学院能够为中国高校与国外大学建立联系和合作平台提供帮助,这也是孔子学院顺应国内需求的一个表现。

我们认为,正如Yang (2010) 所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到一定程度时,该国向其他国家推广其语言和文化是理所当然的。

2. 树立对外形象

中国建立孔子学院的国外动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了树立中国的国家形象。Paradise(2009),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导致“中国威胁论”的产生。同时,中国“和平发展”(其前身为“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更加深了美国和其他中国贸易伙伴的紧张情绪。孔子学院有助于改变这种印象,以期树立一个友好的、温和的中国形象。中国致力于促进文化交流,花费巨资吸引为数众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在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学创设汉语项目,在世界范围内的100多所大学设立汉语资助项目,其目的都是为了树立一个新的、现代的、有文化吸引力的中国形象(Bolewski & Rietig, 2008)。

Guo (2008)也谈到,孔子学院通过传播中国文化,是树立中国国家形象(China's image management)的一部分,以赢取在国际上的“声誉(goodwill)”。它所传递的信息是“和谐”,而其目的在于创造、维护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以服务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反过来,中国国内的发展又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作者还以中国国内的有关活动如庆祝孔子诞辰、创建中国品牌文化(长城、大熊猫、京剧、北京奥运会、电影明星、载人航天、三峡等)、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学研究中心”为例,认为在中国“孔子正在回归”。而中国古代文化的复兴提升了中国的形象。此外,作者还认为,孔子学院的目的是提升中国文化,同时,消除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即希望如何让世界“看”中国。

中国选择孔子作为“形象”,其意并不在传播儒家价值观,而在于缓解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将中国的吸引力最大化,以赢取外国人对中国的

好感和积极评价,这显示了中国外交迈上了一个自信的新台阶。中国通过语言与文化的推广来提升国家形象,可以说,孔子学院是中国外交的旗舰。但是,孔子学院并不是中国大使馆,也不是中国研究中心,它与政治无关,只提供教育(Hoare-Vance, 2009)。

就目前看来,尽管针对孔子学院有这样那样的反对声音或行为,但是,在增进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树立中国国家形象、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Chan, 2010)等方面,孔子学院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為什麼是“孔子”學院,是哪一個“孔子”

Guo (2008) 谈到,中国“孔子基金”与深圳一家公司合作开发100集的卡通电视剧,介绍孔子的生平和活动,打造一个更为流行、更易于被接受的孔子形象,以代替“标准的”、“政府性的”孔子形象。而这种孔子形象,应该是“温和的”。

为什么选择“孔子”?在西方看来,这是一个品牌问题。孔子所倡导的“有教无类”等思想,在西方都易于被接受。而孔子在西方是一位“知名人士”。对于那些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如韩国、日本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孔子”都是一个不会引起争议的对象。西方人认为,选择“孔子”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做法,即以一位“慈爱的老人”为形象来达到掩饰孔子学院中国的目的(Starr, 2009)。作者进而认为,中国选择在韩国建立第一所孔子学院,其意正在于此。

Bell (2009) 从儒家与法家的对比入手,认为许多国际国内问题都是无法用法家的思想或法律来解决的,而儒家正可为此提供思想资源。即儒家可以为一个国家的政策提供道德指引,当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鸿沟时,儒家还可以为社会批评家们提供道德上的思想资源。当民主理想与美国政府的实际作为之间产生鸿沟时,美国的批评家对之进行批判,同样,当中国政府实际是如何对待其他国家时,中国的批评家可以从儒家那里汲取思想资源,并对之进行评判。由此可见,在当下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儒家重新焕发夺目的光辉有其深远根源和意义。

但是,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哪一个“孔子”?即儒家思想中哪些东西才是西方人刻意强调的?

在“调和社会主义与儒家思想”(Reconciling Socialism and Confucianism?)一文中,Bell (2010) 从民众、政治、学界甚至于丹的《论语心得》等层面分析为什么现代中国需要儒家思想。Bell认为,儒家思想具有全球普世性,其中最显见的是反对奴役、反对种族灭绝、反对种族歧视。所以,西方学者转向儒家寻求希望和灵感。作者引用“开放的儒家”(Liberal Confucianism)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是由一部分大陆以外的研究者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儒家思想不应与诸如人权、民主等观念相矛盾,而是能够促进人权和民主。但问题是,自由主义被用来作为评判儒家思想的道德基石。儒家思想中与自由主义相吻合的就被提升,而相悖逆的就被抛弃?或者是否可以在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这些可能性均被“开放的儒家”所拒绝。毕竟,儒家思想并不是用于提升自由价值观念的一个工具。另一概念是“左倾儒家”(left

Confucianism)。“左倾儒家”致力于在某方面把社会主义和儒家传统结合起来,以儒家来丰富、改变社会主义。作者认为,融合了西方价值如社会民主、团结、人权、守法的“左倾儒家”应该代替马克思主义,并被中国接受(adopted)并在中国适应(adapted)。作者还对儒家的等级差序、家一国一天下的社会结构模式、男女平等、自下而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人权、以“家”养老等所谓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儒家“全球化”的最大障碍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作者进而认为,中国的社会批评家应有更大的独立性,并以中国古代的批评家为例,认为他们对社会的批判能够一针见血,就是因为他们远离首都,不受政府影响。在媒体方面,认为应该为社会树立道德典范、为民众更好的生活呼吁、表达对穷困人群的同情。允许私人媒体存在,而并非为某一党派存在,并为促进社会和谐而努力。穷困人群如鳏寡孤独者及老者的保险应该由政府承担,而不是由家庭承担。这里,我们姑且不论作者信马由缰的写作风格,单就其对儒家思想的把握和概括而言,就已然离题不止万里。而我们似乎又再一次看到了西方“自由化思潮”的回光返照。

Bolewski & Rietig (2008) 在论述中国外交谈判风格时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列举,其中包括重义轻利、多倾听对方/很好的倾听者、对朋友的忠诚、家庭责任、个人荣誉感、诚实、让对方先说/客人优先等等。作者着重对“关系(友谊)”、“留面子”(face saving)进行了阐述,认为在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时,需多了解对方背景情况,设计、考虑好谈判的每一个步骤,把让中国人丢面子的风险减到最小。当然,作者也发现,中国外交谈判风格正越来越多地吸取西方的东西,逐渐向西方靠拢。可以说,Bolewski & Rietig对儒家思想的把握比Bell更准确,也更实用。

孔子學院有哪些功用

我们发现,在孔子学院海外研究中,以孔子学院与我国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关系研究为最丰富。概言之,孔子学院的功用即是孔子学院提升中国软实力。这包括外交、经济、文化三个方面。

在《软实力:世界政治的成功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一书中,Nye (2004) 最早对硬实力和软实力进行了区分和阐述。Nye认为,“软实力”是指通过吸引力而非胁迫或支付金钱,获取你所想要的东西的一种能力。软实力包括文化、价值观、习俗、政策。近来,西方的研究者把软实力的范围进行了扩大,甚至连奥运会、姚明、京剧、孔子诞辰庆典、上海世博会、“中国寻根之旅”、“汉语桥”等都被列入了中国软实力范畴。软实力不单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影响,而且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及实现国家外交目的也有重要影响(Ding & Saunders, 2006)。

Lee (2010) 引用Joshua Kurlantzick的话,认为孔子学院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工具。而提升中国软实力是中国的最高国家目标(又见Cho & Jeong, 2008)。同时,作者认为,中国提升软实力面临两个重大挑战,一是消除“中国威胁论”,说服国际社会尤其是

亚洲国家接受中国既定的、可取的“和平崛起”理念。二是通过担负国际责任，获取在国际社会发出中国声音的权利。而中国软实力的来源包括中国发展模式、以“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理论为中心的外交政策、中国文明。

为改善中国形象，中国作为一个建设者的姿态，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富于战略资源的国家签订了诸多协议。尽管Nye强调软实力中的政治价值，但中国更倾向于以经济发展来打造吸引力。Heng的疑问是，中国是以经济吸引还是引诱(inducement)? 作者进而认为，软实力的提升无需政府的主导，无政府主导的软实力会自然出现(Heng, 2010)。

Yang (2010) 引用Li、Mirmirani和Ilacqua的话，认为中国建立孔子学院以达到支配世界的目的是毫无意义的。Yang的一个访谈对象直言：“我并不指责中国提升软实力。我甚至认为中国应该做得更多。”

外交方面

Bolewski & Rietig (2008)认为，中国新的外交政策已经注意到如何利用文化关系强化在国际上的国家形象。简言之，即以文化促外交。作者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两次大的改变。第一次是天安门事件之后。第二次是21世纪初，中国外交呈现出新的特点：行动主义、合作、多边贸易和实用主义。此外还包括，通过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塑造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向外界散布信息，对特定问题的注意。其目的在于促进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消除由于硬实力所带来的“中国威胁论”。换言之，中国外交的目的是赢取世界的“民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people around the globe)。而Lee (2010) 则把中国外交的目的概括为“现代化”、“爱国主义”、“地区主义”，其中“地区主义”指在某个地区组织某种形式的会谈以获取中国在该地区的多边贸易利益，如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六方会谈。

Hoare-Vance (2009) 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外交的旗舰，中国建立孔子学院与自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实行的“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一致，即尽量避免以军事或经济手段来应对处理国际问题。孔子学院虽然与政治无关，但它仍然代表着中国，代表着中国的政治路线。这其实是中国所奉行的文化外交战略。文化外交是外交的一部分，是指某一国通过撒布其文化资源、促进其文化向外传播，以达到应付国际环境的一种行为。文化外交包括如下形式：政府资助的学术项目，如美国的“南亚与欧洲研究”；政府资助的体育活动，如北京2008年奥运会；艺术巡展；国际合作；语言与文化传播机构。等等。因此说，孔子学院是中国外交的一部分，即文化外交。随着中国国际实力的增强，中国政府试图以文化力量来影响其外交，以赢取国际社会的认同。

Starr (2009) 则从全球孔子学院的分布状况来分析其政治、经济上的功用。Starr认为，中国建立孔子学院的出发点并非为了外交，而是出于政治、经济的考虑，即孔子学院的建立反映了中国欲与其贸易合作伙伴而非历史意识形态同盟国深化关系。如韩国有12所孔子学院，而中国长期的同盟国朝鲜则没有一所孔子学院。其次如美国有39所，日本14所，泰国13所。而资源富有的非洲则正在成为孔子学院拓展的领域。

Ding & Saunders (2006) 有一句话形象地概括了中国外交与孔子学院之间的关系, “中国外交展翅, 孔子学院也将翱翔。”

经济經濟方面 .

在谈到中国高校为什么合办孔子学院时, Guo (2008) 说,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高校可以从中获取额外收入。通过对汉办的访谈, Paradise (2009) 谈到, 孔子学院帮助重庆一家摩托车公司将其产品出口到泰国, 而泰国一些公司也试图通过孔子学院搭建与中国公司联系的桥梁。Tan (2006) 也谈到, 中国与新加坡双边贸易额由1991年的53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369亿美元。中国的崛起带来普通话作为世界语言的价值的提升, 政府出于经济动机考虑, 鼓励学生学习汉语。可以说, 新加坡是汉语学习经济目的最明确的国家之一。

日本学者Lee (2010) 是对孔子学院的经济功用阐述最多的一位学者。通过对孔子学院在全球分布状况的分析, Lee认为, 孔子学院集中于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泰国、韩国)和其他比较大的国家(如欧盟、美国), 超过60%的孔子学院都分布在这三大地区和国家, 即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孔子学院在非洲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了Lee的特别关注。在六个月内, 非洲就从零开始, 建立了10所孔子学院。中国与非洲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和援助计划, 都是为了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他引用Jean-Christophe Servant (2005) 的话, 认为这是“新殖民主义”。这包括, 第一,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并非为双方的经济利益服务, 而是为贸易活动中强势国家的利益服务。第二, 非洲国家为中国提供自然资源, 中国利用这些自然资源生产工业产品并卖回到非洲。这导致另一种“南北分化”。他还“引用”2007年孔子学院大会的说法, “英语教育市场是孔子学院教育的手。”根据孔子学院的“某些资料”, 他认为孔子学院推广计划与中国HSK考试密切相关。言下之意, 孔子学院纯粹或主要是为了盈利。

文化方面 .

日本学者Lee (2010) 认为, 孔子学院是兜售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机构。中国文化对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这源于其巨大的人口和无可比拟的市场。Heng (2010) 则认为, 孔子学院并不具备政治价值, 但它确实可以为人们展示中国传统文化, 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全球性的普世价值。除此之外, 中国现代文化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如姚明和张艺谋。

孔子学院的成功将倚靠中国文化的吸引力, 而这将使得孔子学院成为中国软实力提升的重要砝码(Paradise, 2009)。Yang (2010) 则进一步认为, 孔子学院是中国软实力提升最有系统性的政策行为。作者引用访谈者的话说, “我相信孔子学院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我并不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的文化扩张。孔子学院致力于促进外国人对中国、汉语与中国文化的了解, 这与西方历史上的现代化相距甚远, 而西方的现代化实质上

孔子學院面臨哪些問題

虽然孔子学院的建立和发展获得了巨大成功，并引起了世界范围内人士从不同角度的较大关注。同时，海外研究者也注意到孔子学院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概括如下。

1. 孔子学院与所在国的“文化碰撞”及可能导致的“中国威胁论”(Ding & Saunders, 2006; Perkins, 2007; Yang, 2010; Zhao & Huang, 2010)。有人认为，孔子学院在海外窃取情报和技术，从事间谍行动(Hoare-Vance, 2009; Schmidt, 2010; Starr, 2009)。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以“和平发展”代替“和平崛起”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更有研究者指出，用“中国重现”(re-emergence of China)一词可能更加准确。

2. 中国多重的、有野心的外交目标弱化中国文化的吸引力。软实力，包括文化软实力，对国家利益有帮助，但也有其局限性。中国应该学会如何调和其外交政策(使其更有一致性和灵活性)及其与中国价值(包括汉语与中国文化)提升的关系(Ding & Saunders, 2006)。

3. 语言竞争问题。汉语方言如闽南话、广东话、(台湾)国语等在海外有很多的使用者，如何协调汉语(普通话)与汉语方言的关系，是摆在汉语国际推广面前的一大挑战(Ding & Saunders, 2006; Hoare-Vance, 2009; Zhao & Huang, 2010)。

4. 孔子学院的质量如何保证。很多大学建立了孔子学院，但实际上存在一些不运作的孔子学院；同时，如今多数孔子学院都致力于推广汉语与中国文化，但中小学汉语教师培训却少之又少(Starr, 2009)。尤其是孔子学院设立在先前没有汉语教学机构的国外大学时，这些大学却又要求孔子学院提供本科和研究生汉语学分课程，这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Yang, 2010)。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孔子学院发展过快过大。Yang 引用一位访谈者的话说，“这里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做任何事情时，总是希望把它做大，而且做得很快。这可能给人以一些错误印象。”

5. 孔子学院经费如何得到保障。汉办拨付给孔子学院一定的启动资金，并承诺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将继续提供资助。此后，孔子学院将自负盈亏。但这并不现实。好在汉办已经意识到此问题，将在孔子学院初期发展的几年之后，继续为其提供资金。除了中国方面在资金和政治上对孔子学院的支持外，孔子学院如何获得所在国和当地政府的资助也非常关键。如美国芝加哥市就曾在2008年为其孔子学院和汉语教学提供了443万美元的资助(Yang, 2010)。Hoare-Vance (2009) 则认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语言学院”相比，中国对孔子学院的经费投入远远不够。

6. 孔子学院与中国大学方面的合作并非易事。中国方面缺乏成功教学的管理和文化知识。中国高校仍需为外派的汉语教师支付薪酬，但中国高校却难以从中获得相应的回报。而较低的报酬也越来越难以吸引有经验的教师赴海外进行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推广。根据我们的经验和了解，该问题确实存在。当然还有其他问题，如很多汉语教师迟迟难以获得签证，而延误孔子学院所在国的汉语教学(Starr, 2009; Yang, 2010)

7. 为什么世界知名大学没有孔子学院。这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Hoare-

是文化扩张。”“总体而言，它(孔子学院——引者注)是积极的。中国政治的总体趋势是走向民主。我们需要相互了解，但不仅是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还要站在中国的立场。至少在我们当地的商务领域，孔子学院正在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孔子学院不应只是促进对中国的了解，还可以作为密切相互之间关系和思想交流的平台。……作为中国与当地联系的一个机构，孔子学院不应该只是教学机构，而且也应该是社会交往和促进友谊的地方。”实际上，孔子学院有效地缓解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Yang引用访谈者的话说，孔子学院与国外机构之间是跨文化交流的一种形态。孔子学院在国外大学的建立和发展就是一个跨文化理解的过程。在不同的文化和教育机构之间，不同的观点要得以理解，其唯一途径是更多的交流。这与跨文化交流异曲同工：从差异甚至对立观点出发，通过相互了解，共享价值、观念与合作。

Ding & Saunders (2006) 从文化的定义入手，引出“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他们认为，“文化软实力”是指一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对另一国家或民族的影响。作者分析了西方文化研究者对文化软实力的几种观点及其对文化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如 Gramsci 的“文化霸权主义”、Morgenthau 的“文化模式”、Huntington 的“文明的冲突”论。认为文化软实力有比军队、政治、经济更强大的影响力。中国文化有着整体性，即说汉语或汉语方言的能力以及中国历久不变的文化核心，如儒家思想的孝顺、对长辈和祖先的遵从、对权威的尊重、教育的重要性、稳定的社会伦理等等，其他如风水、葬礼仪式、占卜术等等。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文化牢牢地把中国凝聚在一起，中国异常强烈的国家身份帮助中国经受了过去150年的屈辱，中国文化也是中国上个世纪后25年里前所未有的戏剧性现代化进程中的中流砥柱。从元朝、唐朝、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化都显示了其对内持续的凝聚力和对外强大的同化力。而包括孔子学院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化，如姚明、北京奥运会、旅游业、来华留学生、学术研究及学术投入，都展示出中国的软实力及其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同时，中国文化全球化也面临着四个挑战：一，中国软实力的生命力存疑。作者引用Nye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政治上的原因，如民主、人权、国际事务的责任、天安门事件等，汉语与中国文化的全球吸引力不能持久。二，信息革命的挑战。海外华人通过信息技术影响中国国内；中国周边国家如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的“去中国化”。三，西方语言与文化残留的支配地位。到目前为止，不管是中国精英文化还是流行文化的影响力，都无法与美国抗衡。在当今文化混乱的世界，中国价值只好与西方共存，汉语(如孔子学院——引者注)也一样。四，语言竞争。汉语方言如闽南话、广东话等在海外有很多的使用者。如何协调汉语(普通话)与汉语方言的关系，是摆在汉语国际推广面前的一大挑战。

Bolewski & Rietig (2008) 则认为，中国的文化活动及中国文化的流行，如孔子学院，都是为树立现代的、文化有吸引力的中国形象。作者借用跨文化交流学中的“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两个概念，从“关系”(guanxi, friendship)和“留面子”(face saving)两个方面具体阐述了中国的低语境文化对外交谈判风格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作者同时认为，中国的外交谈判风格已逐渐接受西方的风格，呈现实用、一致、微妙等特征，中国学会与西方大国周旋并从中获益。

Vance (2009) 的回答是,世界知名大学不接受孔子学院的原因在于,与孔子学院所能提供的好处相比,他们认为保持自己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性更为重要。Paradise (2009) 的回答是,孔子学院的目标人群是社区和没有汉语项目的地区,而非精英人群。

8. 教师和教材短缺。汉语教师短缺是一个显见的问题,而如何对课程风格进行调整以满足孔子学院所在国当地文化的需求,则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问题。(Bianco, 2007; Zhao & Huang, 2010)。

9. 孔子学院“影响学术自由”。这以Schmidt (2010) “At U.S. Colleges, Chinese-financed centers prompt worries about academic freedom”一文为代表。作者引用西方某些人士的言论,并以孔子学院因法轮功、台湾问题、达赖喇嘛等而取消、缩减活动为例证,证明孔子学院影响学术自由,而美国有些大学就是“因此”而拒绝承办孔子学院。其理由是,孔子学院受中国政府资助,中国政府不允许通过孔子学院进行有损中国形象的活动。另一方面,作者不得不承认,孔子学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而位于Ann Arbor的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政治科学副教授Mary E. Gallagher则说,在那些“在中国有争议的和敏感的”论题讨论方面,孔子学院是自由的,如维吾尔族。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则说,没有遇到来自中国政府或中国南开大学(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中方合作伙伴)的“干涉和压力”。

研究特点

Paradise (2009) 注意到,国际上对孔子学院的学术研究关注很少。情况确实如此。通过搜索国际专业学术期刊网,我们所得学术论文不过20篇。Paradise认为,海外对孔子学院的学术研究较少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软实力还处于初期;二,中国的政治价值没有吸引人的地方(Heng, 2010)。如果说作者所说的第一点原因是正确的话,那么,第二点则有失偏颇。总起来看,海外孔子学院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1. 孔子学院“外围”研究很多,“内部”研究很少。海外研究者多着重于他们所感兴趣的方面,如孔子学院与中国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关系问题。而对孔子学院的内部运作,如课程设置、教师培训、跨文化适应、教材研发、教学方法革新、信息技术运用、课堂管理、教学测量与评估、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则几乎没有涉及。唯有新加坡学者Tan (2006) 在“Change and continuity: Chinese language policy in Singapore”一文中对新加坡的汉语教育政策调整及其具体实施方法有较多介绍和探讨。

2. 书斋式文献梳理很多,实地调查研究很少。海外研究者在很多问题上“想当然”,难免以讹传讹。据统计,在近20篇论文的作者中,没有一人在孔子学院工作过,仅有1人对孔子学院进行过实地考察。绝大部分研究者使用二手数据和资料,如所在国媒体的新闻报道。如对孔子学院是否盈利的认识上,很多研究者“想当然”地认为孔子学院能够为中国或中国高校带来收益(Guo, 2008; Lee, 2010)。又如对孔子学院是否对学术自由构成威胁的问题上, Schmidt (2010) “引用”某一位从未接触过孔子学院的美国教授的话,认为孔子学院“行使宣传功能”,并以此作为拒绝承办孔子学院的

理由。也就是说,他们“担心”孔子学院“可能”会影响学术自由,故而不承办孔子学院。

3. 国外研究很多,国内研究(英文)很少。在近20篇论文中,只有两篇是国内研究者所作(Yang, 2010; Zhao & Huang, 2010)。其中Yang来自中国香港大学, Zhao & Huang来自浙江大学。

4. 对孔子学院提出批评者很多,提出建设性建议和意见者很少。

對策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国外针对孔子学院的批评甚至中伤、诬蔑如此之多,我们该如何应对?如今中国的文化推广面临着最有利的时机,中国的食物、音乐、艺术等等都已经激起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兴趣(Paradise, 2009)。我们该如何把握这一有利时机,如何保持现有良好发展势头,实现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

1. 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包括各有关部委、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我驻外使领馆、各有关高校、孔子学院所在国大学、孔子学院教职员工),统筹规划,积极组织相关有特色的文化活动(如春节、中秋节、龙舟节、书画展、电影节、歌舞晚会、武术表演、艺术展、有关中国的讲座等等),打造中国文化与所在国文化交流对话的平台,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进行宣传,树立一个温和的、友好的、爱好和平的中国形象;适当开放孔子学院,以孔子学院为中国对外窗口,以供有兴趣的海外人士参观访问,使孔子学院所在国民众有机会零距离接触孔子学院,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消除误解、成见、偏见。

2. 以中国文化精髓为依托,以汉语语言为突破口,发展孔子学院,提升中国软实力。Paradise (2009)认为,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其根本在于倚靠中国文化。语言是文化传播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也是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心因素(Ding & Saunders, 2006)。中国文明是最大的软实力,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的核心(Cho & Jeong, 2008)。而“和”又是核心中的核心。应加强对儒家思想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研究,深入挖掘其普世性内涵,挖掘儒家思想与西方思想的耦合点,建立以“和”为核心的全球理论架构,以回应“哪一个‘孔子’”的问题,推进“和平发展”理念。切实解决“汉语难学、汉字难写”等迫切问题。以汉语学习带动中国文化推广,以中国文化推广促进汉语学习。树立中国对外形象,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3. 巩固现有以汉语与中国文化为主攻方向的孔子学院,适当加大专业性孔子学院的建设力度。当然,以汉语与中国文化为主攻方向的孔子学院和专业性孔子学院(如中医孔子学院、商务孔子学院、科技孔子学院等等)如何布局,侧重点怎样,相互之间如何配合,都需要国家层面、孔子学院总部领导层和相关专家学者进行深入调查和详细论证。如此,则需要扩大孔子学院“准入口”,把更多国内知名的理、工、农、医类院校纳入进来,覆盖更多的学科领域,拓宽孔子学院的办学渠道,丰富孔子学院办学模式和发展内涵,创新孔子学院课程类型和教学手段,以吸收更多不同学习目的学

员,把我国相关的先进成果推介出去。

Zhao & Huang (2010) 注意到,新近成立的孔子学院多为专业性很强的孔子学院,如伦敦南岸大学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 at London South Bank University)是全球首家中医孔子学院,为学员提供针灸专业。葡萄牙Minho大学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 at University of Minho)组织一系列关于当代中国的讲座,内容包括当代中国政治与经济、当代中国与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企业文化、中国外交史等等。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注重推介中国在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贡献。昆士兰的另外一所孔子学院则致力于汉语教师培训。Newcastle大学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的特色则是汉语远程教学(笔者曾工作过的美国堪萨斯大学孔子学院的远程交互式汉语与中国文化推广项目也非常成功)。Royal Melbourne 技术学院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e 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中医项目也非常有名。

4. 设立面向全球的孔子学院专项研究基金和项目。随着孔子学院在全球遍地开花,创建一个国际性的孔子学院研究平台、打造一支孔子学院研究队伍势在必行。政府须高度重视孔子学院研究并加大资助力度,鼓励孔子学院及其教职员工和国内外相关研究者对孔子学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包括孔子学院“外围”研究、孔子学院“内部运作”研究、孔子学院与世界其他国家“语言学院”的比较研究等等),对比并修正现有的多元文化教育和跨文化传播理论,走出“孔子学院或国际汉语教育研究就是编写教材”这一固有模式,支持孔子学院研究“请进来”、“走出去”,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来自不同渠道的“中国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发展模式”研究的和谐之音。

結語

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东方语言与文化走向西方、与西方展开平等对话的形式之一。反过来,早在18世纪,这种文化之间的对话形式就已经由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宣讲福音得以体现。与西方对东方文化影响相比,东方语言与文化对西方的进入和影响已经晚了200多年。即使与世界其他著名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如1883年成立的法语联盟、1934年成立的英国文化委员会、1951年成立的歌德学院、1991年成立的塞万提斯学院)相比,2004年成立的孔子学院还是个新生儿,而其影响也很有限。人类几千年的文明进程告诉我们,文化是发展变化的,更是彼此交流互动交融的。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西方文化中出现一些东方文化的思想和表现形式,是一件再平常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西方社会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紧张甚或抵制。如今,麦当劳、肯德基遍布大街小巷,中国人不仅乐于接受,而且还融汇创新出如“鸡蛋汉堡包”等之类的中西合璧食品。这种相互交流、接受、融合的过程,对互动的双方及其文化都是一种难得的财富和提升。

Cho & Jeong (2008) 认为,中国将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领导者。我们认为,这种

断言为时尚早。就目前来看,汉语尚不可能取代英语成为“世界语”(Zhao & Huang, 2010)。美国依旧是支配世界的决定性力量(Chan, 2010)。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随着孔子学院的多层次发展、国际汉语教育在学科归属上的明晰,孔子学院的发展还将会历经一个长期的、科学的历练过程,国际汉语教育者还将经历更多跨文化实践和考验。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软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加上各有关方面的通力合作,中国定能有效处理好中国文化与孔子学院所在国文化及中国文化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定能将中国文化之精髓——“和而不同”理念——推向世界,为世界的和平发展筑基助力,而孔子学院也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美好的未来。借用Starr (2009)的话来说,“低估汉语(我们要加上“中国文化”——引者注)的潜力是愚蠢的。”

参考文献

- Bell, Daniel. (2009). War, peace, and China's soft power: A Confucian approach. *Diogenes*, 56 (1), 26-40.
- Bell, Daniel. (2010). Reconciling Socialism and Confucianism? Walzer, M. responds Bell, D. A. replies reviving tradition in China. *Dissent*, 57(1), 91-99.
- Bianco, Joseph Lo. (2007). Emergent China and Chinese: Language planning categories. *Language Policy*, 6, 3-26.
- Bolewski, Wilfried & Rietig, Candy M. (2008). The cultural impact on China's new diplomacy. *The Whitehead Journa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mmer/Fall)*, 83-96.
- Chan, Kenneth. (2010). Images, visibility and the prospects of soft power of the EU in Asia: the case of China. *Asia Eur J*, 8, 133-147.
- Cho, Young Nam; Jeong, Jong Ho (2008). China's soft power: Discussions, resources, and prospects. *Asian Survey*, 48(3), May/June, 453-472.
- Ding, Sheng; Saunders, Robert A. (2006). Talking up China: An analysis of China's rising cultural power and global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ast Asia*, 23(2), 3-33.
- Guo, Xiaolin. (2008). Repackaging Confucius: PRC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soft power. *Asia Paper*, January, 1-50.
- Hanban. (2010). http://www.hanban.edu.cn/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Retrieved Feb 9, 2011.
- Heng, Yee-Kuang. (2010).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o is the softest of them all? Evaluating Japanese and Chinese strategies in the 'soft' power competition er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10, 275-304.
- Hoare-Vance, Stephen. (2009).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China's evolving foreign policy. Unpublished MA Thesis at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UK.

- Lee, Kyoungtaek. (2010). Towards a new framework for soft power: An observation of China's Confucius Institute. *Inter Faculty, 1*. Retrieved Dec 28, 2010, from <https://journal.hass.tsukuba.ac.jp/interfaculty/article/view/3/5>.
- Nye, Joseph S. (2004).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Paradise, James. (2009).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y: The rol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bolstering Beijing's soft power. *Asian Survey, 49* (4), 647-669.
- Perkins, Dwight. (2007). China's soft power.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Fall)*, 82-83.
- Schmidt, Peter. (2010). At U.S. colleges, Chinese-financed centers prompt worries about academic freedom.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57* (9), A8-A10.
- Starr, Don. (2009).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Europe: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44*(1), 65-82.
- Tan, Charlene. (2006). Change and continuity: Chinese language policy in Singapore. *Language Policy, 5*(1), 41-62.
- Yang, Rui. (2010). Soft power and higher education: An examination of China's Confucius Institutes. *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 8*(2), 235-245.
- Zhao, Hongqin; Huang, Jianbin. (2010). China's policy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the use of overseas Confucius Institutes. *Educational Research for Policy and Practice, 9*(2), 127-142.